

蒯因的不确定性论题与事实问题

胡庭树^{*}

〔摘要〕 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论题,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种不确定性都是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之上的,都存在着逻辑上不相容,但经验上等价的的不同系统。前者断言经验上等价的的不同翻译系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翻译手册,因为没有所谓意义这样的实体,不存在关于意义的事实问题;后者断言两种逻辑上不相容但经验上等价的理论系统不可能都是真的,这里存在事实问题,我们选择了一种理论,就意味着拒绝了另一种与之对立的理论。

〔关键词〕 蒯因;不充分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测知性;事实问题

蒯因(W. V. Quine)所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是他整个哲学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正如赖特(C. Wright)所说,“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在现代分析哲学中一直是讨论最为广泛和最有争议性的论题之一。”^①普特南(H. Putnam)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是“自康德的范畴先验演绎以来最吸引人和得到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②然而,这一论题常常与蒯因的另一个论题,即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本文拟依据蒯因本人的观点与论述,仔细辨析这两种不确定性论题的准确含义,不仅找出它们的联系,而且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这项工作对于正确评价这两个论题,对于深刻理解蒯因的整个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与事实问题

在理论与经验证据关系的问题上,蒯因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不充分决定性论题”(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即证据不足以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决定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这两种或多种理论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但均可得到经验证据的检验与支持。具言之,如果理论 T_1 与所有的证据D相一致,存在多个与 T_1 经验上完全等价,理论上互不相容的相互竞争的理论,那么,如何在多个理论中选择正确的理论,这不是经验观察所能决定的。也就是说,经验证据不能充分地决定理论

^{*}胡庭树,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蒯因著作翻译与研究”(16BZX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C. Wright,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in B. Hale & C. Wright (eds.),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 397.

^②H. Putna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9.

的选择。因为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超越了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因此,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能够从相同的观察事件中发展而来。

在蒯因看来,过去的证据不能充分决定物理理论,未来的观察也可能与之发生冲突。我们把过去和现在的证据合起来还是不能充分决定物理理论,因为一些与其发生冲突的可观察事件也可能碰巧未被观察到,即使把所有可能的观察加在一起,仍然不能完全决定理论,因为理论词项的观察标准是灵活而不完整的。^①总之,科学理论基于观察经验,但观察经验却又不足以决定科学理论的真假,这是由于理论和经验之间存在某种松散的联系,这种松散性不仅存在于高端的物理理论层面,也出现于日常的普通科学领域。不过,“不充分决定性”是十分模糊的概念,科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经验不充分决定并无明确的界定。蒯因指出,“理论词项的观察标准通常是灵活的、不完整的。只要人们能就这一普遍的观点达成一致,至于物理理论在强的意义上为经验不确定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并不强求也要达成一致。”^②

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与蒯因的整体主义证据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蒯因提出整体主义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逻辑经验主义关于意义证实原则的困境。蒯因认为单个的命题或陈述不能作为意义的单位,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③无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伪某个命题,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对理论系统中的其他命题做出相应的调整来消解这种反证。换言之,整体内部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或免于被修正,因为经验证据对理论整体的确定是不充分的。正如蒯因所言,“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的限定是如此的不充分,以致在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以再评价的问题上是具有很大选择自由的。”^④上述内容可以通过逻辑方法予以扼要的说明,假设理论T为句子 P_1 和 P_2 的合取,即句子集 (P_1P_2) , Q_1 为该理论所蕴涵的一个观察结果,那么理论和观察的关系便可表述为 $P_1P_2 \rightarrow Q_1$ 。如果此条件句的蕴涵关系成立,那么,当我们发现观察结果 Q_1 为假时,就构成了否定T的证据,按照否定后件式(modus tollens)的逻辑规则,我们可以得出 $\sim T$,即 $\sim (P_1P_2)$ 的结论。然而,根据德摩根定律, $\sim (P_1P_2)$ 即为 $\sim P_1 \vee \sim P_2$,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得出要么 P_1 为假,要么 P_2 为假,但究竟哪一个为假,我们并不清楚。可见,虽然我们并不能从整体主义逻辑地推导出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但两者的联系是相当明显的:整体主义表明,反常的证据不足以在不同的理论修改方案中作出选择;而不充分决定性论题则进一步表明,证据不足以在不同的理论选项中作出选择。

从认识论上讲,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旨在表明存在两种(或多种)构造世界的方式或理论系统。对于经验上等价的两种理论,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逻辑上不相容但经验上等价的两个理论可以通过谓词的重新解释来消除二者的矛盾。例如,理论 T_1 使用专业词项“分子”和“电子”来命名理论 T_2 中与之正好相反的词项“电子”和“分子”所表述的内容。假如这两个词项完全是理论上的,二者都不会出现在各自的观察句中, T_1 与 T_2 两种理论显然是经验上等价的,即二者都蕴含相同的观察条件句,但 T_1 和 T_2 是逻辑不相容的,因为在两种理论中对“分子”和“电子”所赋予的属性正好是完全相反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 T_1 与 T_2 两种理论的区别仅仅视为术语层面的区别,认为它们所描述的是同一个理论。我们通过谓词的重新解释便可以将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两种理论变成一种理论,从而让 T_1 与 T_2 获得逻辑上相容,成为同一种理论的两种不同表述。这样,我们就不存在理论的选择问题,充其量是理论术语的使用习惯问题。第二,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两种理论无法通过谓词的重新解释来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或冲突。那么,这两种理论的真值存在以下几种情

①W. V. Quine, “On the reasons for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67, 1970, pp. 178—179.

②W. V. Quine, “On the reasons for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③后来,蒯因在他的《回首两个教条》(1991)一文中对整体论的表述有所缓和,他承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中的极端整体论太过强硬,温和整体论才更加切题。

④W. V.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2—45.

况： T_1 真， T_2 假，或 T_2 真， T_1 假，或 T_1 和 T_2 同时为假，但 T_1 与 T_2 不可能同时为真。第三，两种理论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但在理论上并不等价。也就是说，两种理论有着相同的经验内容，蕴涵相同的观察直言句，但不能通过任何代理关系（如代理函项）使得这两种理论相互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理论是异质的，我们坚持一种理论为真，但无法断定另一种理论为假，只能将其视为无意义的理论而加以拒斥。^①可见，一旦我们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选择一种理论，也就意味着我们对经验上等价的的其他理论的否定。而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之间作出选择所依据的是事实而不仅仅是证据，因为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都与证据相符，证据本身无法对理论的真假作出判断。

既然相互竞争的理论存在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情况，而两个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中最多只能有一个是真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断定理论的真假呢？蒯因认为，“当我们继续从内部修补我们的世界系统时，无论如何都不存在超理论的真理，不存在比我们现在正在声称和追求的真理更高的真理。如果我们的理论是刚才设想的两个相互竞争的最好理论中的一个，那么，坚持我们的理论为真而另一个与之冲突的理论为假就是我们的立场。”^②换言之，真假判断是一个内在于理论的问题，我们必须先接受一个理论，然后才能按照这个理论的标准来判断陈述的真假。显然，我们一旦接受某个理论，结果便意味着我们将从该理论的立场来判断陈述的真假。因此，当我们用理论 T_1 的立场来判断一个与之冲突的理论 T_2 时，我们就可以判定理论 T_2 为假。这样，一个陈述的真假就取决于我们选择哪个理论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只能先选择一个立场，然后才能判定与之对立的理论为假。为什么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存在事实问题呢？我们知道，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属于证据范畴，即满足证据要求的可以有好几种理论 T_1 、 T_2 ……，它们都蕴涵相同的观察证据。证据本身并不足以决定它们的真假，如果仅从证据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认为它们是真的。假如我们最后选择了 T_1 ，这就意味着我们认为 T_1 是真的，但我们认为是真的，事实上未必就是真的，因为一个理论是真的，是由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实而不是由于我们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 T_1 与 T_2 从证据的角度看并无差别，但从真假的角度看却必定不可能同时为真，究竟哪一个为真，哪一个为假，或者都为假，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这个事实问题在这里无法通过搜集证据的方法加以解决，即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评估证据来淘汰其中的一个理论，因为它们的证据都是一样的，因此无法淘汰，而只能根据一些策略性因素，如保守性、简单性等原则决定之。换言之，一个理论为真，是通过事实而为真的，而不是通过证据而为真的，因为经验上等价的几种理论都与证据相一致。即使我们承认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同时为真，我们也不能否定存在事实问题。因此，不管我们依据什么原则，选择什么立场，这里涉及的都是事实问题。

二、翻译的不确定性与事实问题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thesis of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的要旨就是，土著语言中的一种表达式可以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得到同等辩护的方式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意义不同。有学者把翻译的不确定性分为强的翻译不确定性和弱的翻译不确定性，前者指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后者指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③事实上，翻译的不确定性与指称的不确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题。当然，指称的翻译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一并加以讨论。

^①W. V. Quine, *Pursuit of Truth*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6—97.

^②W. V. Quine, “On empirical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 in D. Føllesdal & D. B. Quine (eds.), *Confessions of a Confirmed Extensionalist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42.

^③R. F. Gibson, “Translation, Physics, and Facts of the Matter”, in L. E. Hahn and P. A. Schilpp (eds.), *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 139—154.

蒯因是通过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来论证翻译不确定性这一论题的。所谓“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即对迄今从未被接触过的土著民族语言的翻译。该思想实验的大意是,当语言学家看见一只飞奔的兔子从眼前跑过,听到土人喊了一声“Gavagai!”,他便根据这一情景尝试性地把它翻译成“Rabbit!”,然后再将该观察句与当时的情景结合起来,以询问的方式观察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倾向,逐步缩小猜测的范围来检验其翻译。这里容易造成误解的就是如何理解表达式“gavagai”的问题。如果把这个表达式作为大写的“Gavagai”来理解,它是一个观察句,“Rabbit”对于语言学家的刺激意义与“Gavagai”对于土人的刺激意义是相同的或相似的。或者说,“Rabbit”和“Gavagai”具有刺激同义性。但是,刺激同义性概念本身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土人对于“Gavagai?”这个问句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还可能依赖当下刺激时出现的附随信息。严格说来,“Gavagai”的肯定刺激意义应该是一个人在不受任何附随信息影响的情况下,面对“Gavagai?”这个问句作出肯定回答的刺激。可见,刺激同义性的要求过于严格,很难在土语的场合句和它的翻译之间找到这种绝对的同一性。但是,在彻底翻译的时候,语言学家还是可以用“Rabbit”去翻译“Gavagai”,因为这些刺激意义的不一致可以被解释掉,或者作为未知的干扰信息而加以排除。^①总之,作为观察句,把“Gavagai”翻译成“Rabbit”是确定的,这里不存在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蒯因所说的翻译不确定性在语句层面上主要是针对非观察句而言的。

然而,理解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关键在于:“Gavagai”作为观察句的翻译是确定的,但作为词项的翻译却是不确定的;即使“Gavagai”作为观察句的翻译已经被唯一地确定下来,如译为“Rabbit!”,其指称或指称的翻译仍然是不确定的。具体地讲,即使我们说“Gavagai”和“Rabbit”这两个场合句具有相同的刺激意义,也不能保证“gavagai”和“rabbit”具有相同的外延,即适用于同一个对象,因为它指称的对象既可以是“兔子”,也可以是“兔子的某个时段”、“兔子的某个部分”、“兔群”或“兔性”,等等。如果语言学家从刺激意义的同一性出发,把“gavagai”作为一个普遍词项,认为其外延就是作为普遍词项的“rabbit”的外延,这也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概念结构强加于土人而已。事实上,我们同样也可以把“gavagai”视为一个单独词项,命名所有兔子的集合,或者把“gavagai”看成是命名一个不断重现的、普遍的“兔性”的单独词项。但无论如何,刺激意义是无法对普遍词项和单独词项作出区分的。因此,“Gavagai”和“Rabbit”的刺激同义性是相对于场合句而言的,而作为词项的同义性却并非如此。正如蒯因所言,“场合句和刺激意义是通用货币,而词项和指称是我们概念结构中的土特产。”^②也就是说,将一个无论多么确定的语词用作场合句,即使它的翻译方式只有一种,我们也无法确定它作为一个词项的外延。

把同一用法的土语表达式翻译为词项,具体译为什么性质的词项将会产生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而我们的行为证据对分析假设的决定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可能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分析假设都与我们的言语行为倾向整体一致,但它们彼此却互不相容。也就是说,关于它们的真假,我们无法根据行为证据来加以判定。所以,“在词项身份以及指称问题上,问有没有唯一正确的翻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③这里仍然不存在事实问题。类似的例子,蒯因在《本体论的相对性》一文中对日语“五头牛”的论述也可见一斑。蒯因认为,“在对日文分类词所作的两种描述之间,不存在任何对与错的问题。一种描述适合于更有效地翻译成地道的英语,另一种描述更适合于感受日语的语言特色。两者都同样地符合所有的言语行为倾向。”^④至于第三个日文字是否适用于每一头牛,还是与分类词相结合才能构成对每一头牛都适用的词项,这仍然是不确定的,不存在任何事实问题。

① 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p. 40.

② 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 p. 53.

③ 陈波:《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9页。

④ W. V.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8.

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与蒯因的整体主义也是密切相关的。把一个土语的句子翻译成一个已知语的句子,其中一种翻译手册所提供的翻译可能是另一种翻译手册所拒绝的,但是不同的译文可以在各自的系统内部借助比单个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进行补偿性调整,从而使得两部不同的翻译手册都符合人们的所有言语行为倾向,因而这两部翻译手册都是有用的,可以被同等地接受下来。但是,“至于哪一部是正确的,哪一部是错误的,不存在任何事实问题”。^①两个行为上等值的翻译手册之间的选择是非事实的选择,也并不存在作为实体的语句意义,可以用来决定翻译的对错。只要整体上相关的语句集与言语行为倾向一致,单个理论语句的配对是可以变化的。换言之,只要整体上相关的句子集所蕴涵的经验观察没有变化,谈论单个句子的配对是否是唯一正确的配对就是无意义的。^②蒯因所举的“gavagai”这个例子虽然经典,但在强的意义上,翻译不确定性并不是这个例子所要说明的东西,而它只是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独词句,并没有涉及分析假设,“这里没有补充调整的余地,而且也不需要补充调整”。^③因此,确切地说,更强意义上的翻译不确定性是一些更强的整句论题,“甚至在整句的层次上依然有无法调和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只有靠其他整句翻译中的差异来补偿”。^④这里,倘若要问弱的翻译不确定性和强的翻译不确定性区别何在?可以简单地说,前者的“真”被逐句保留了,后者的“真”被整体取代了。

三、两种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上述两种不确定性与事实问题的分析,我们知道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存在事实问题,而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存在事实问题。下面,我们来谈一谈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两种不确定性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不充分决定性和翻译不确定性的原理和机制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是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前者强调的是经验观察证据,后者强调的是言语行为意义。换言之,理论不充分决定性的依据是证据整体论,而翻译不确定性的依据是意义整体论,它们都可以在整体论中获得合理的辩护。其次,两种不确定性的原因都在于观察句与非观察句之间的差别。在前者的理论系统中,观察句具有确定的经验内容,在后者的翻译系统中,观察句也具有确定的经验意义;在前者的理论系统中,非观察句单独地看没有确定的经验内容,在后者的翻译系统中,非观察句单独地看也没有独立的经验意义。在这两种系统中,全部可能的证据并不足以单独地确定各自的系统。最后,两种不确定性都存在着逻辑上不相容,但经验上等价的的不同系统。前者存在着两种虽不相容但经验等价的理论系统,后者存在着两种虽不相容却同样正确的翻译系统,两种不同的理论系统和两种不同的翻译系统都可以在各自的整体内通过协调而分别与经验观察证据和言语行为倾向一致。

我们知道,尽管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联系和许多相似,但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论题。正如蒯因本人所说,“翻译不确定性不只是物理学的经验不充分决定性特征的一个例子。这里的要点也不只是说,语言学分享了物理学上经验不充分决定性的特征,尽管语言学是行为主义科学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也是物理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另外一回事。”^⑤

首先,两种不确定性论题中一个存在事实问题,一个不存在事实问题。正如蒯因指出,“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同于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因为翻译手册正确与否的根据仅仅是土人的言语行为,而不

①W. V. Quine, “Facts of the Matter”.

②E. Gaudet, *Quine on Meaning: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p. 5.

③W. V. Quine, *Pursuit of Truth* (Rev. ed.), p. 51.

④W. V. Quine, *Pursuit of Truth* (Rev. ed.), p. 50.

⑤W. V. Quine, “On the Reasons for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是隐藏的神经机制。如果不同的译者对某个土著语句的翻译有分歧,但是就土人而言又没有行为能够反映出这种分歧,那么,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自然科学的事例中,却存在这样的事实问题。即使所有可能的观察材料也不足以唯一地揭示它的科学理论。自然的事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论以及所有可能的观察材料。”^①一般来说,物理理论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正确与否,我们只能通过存在事实问题来加以说明。我们对于科学理论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据保守性、简单性、普遍性等标准进行选择,一旦我们对理论系统做出了选择,与我们相对立的理论系统就是错误的。如果科学理论不存在事实问题,没有真假对错之分,那么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经验的检验,也就不能成为我们最后上诉的法庭。但是,翻译手册只是在行为证据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设,不能作为最终的参数。与言语行为倾向的整体相一致的翻译手册,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不存在事实问题。不过,蒯因的意义整体论为翻译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因为意义整体论允许在言语行为倾向整体一致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义只能从语句意义中获得派生。如果意义整体论成立的话,那么除了观察句,其他任何语句(主要是理论语句)都存在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对于观察句以外的语句的意义,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这样,无论是语词,还是语句(观察句除外),它们的意义就可以根据各自的翻译手册来予以固定,这些翻译手册各自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自成一体的系统,都与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一致,因而也就没有对错之分,不存在事实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翻译中的言语行为倾向既是我们检验翻译对错的惟一标准,同时也是翻译中所涉及的惟一事实。而在理论构造中,观察证据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科学理论已超越了经验证据,因此,不能说通过观察证据检验的理论一定是真的。

其次,两种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即使我们确定了关于世界的理论系统,翻译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我们知道,由于物理理论与观察之间存在经验的缺口,即使所有可能的观察是固定的,而物理理论仍然是可变的,那么我们对于物理理论的翻译也是不确定的,即使物理理论被惟一地确定下来,我们关于物理理论的翻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翻译不确定性是无法被归约或消除的。正如蒯因所说,“如果我们决定赞同其中一个关于世界的经验等价系统,无论这个系统是多么任意的,在它之内依然存在翻译的不确定性。”^②

第三,两种不确定性预设的主题和旨意是不同的。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预设的主题是经验内容,而翻译的不确定性预设的主题是刺激。理论层面的语句单独地看并不具有独立的经验内容,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是足够大的语句集才能接受经验的检验。但是,观察直言句(observational categorical)可以单独地接受检验,因为它是由观察句复合而成的,而观察句可以作为最终的检验者直接检验与之对应的观察直言句,从而一步一步地渗透到整个理论系统的内部。观察直言句是联系理论与经验观察的纽带,因而一个理论所蕴涵的那些观察直言句就构成了它的经验内容。这样,如果两个理论蕴涵相同的观察直言句,那么它们就是经验等价的;如果两个观察直言句各自相应的观察句具有相同的刺激意义,那么这两个观察直言句就是同义的。对于翻译不确定性所预设的主题来说,刺激和刺激意义在蒯因的意义理论中占据核心的地位。作为一名行为主义者,蒯因所坚持的意义是一种主体间公共可观察的行为意义,而这种意义正是通过言语行为的刺激反应获得的。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相对立的是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如果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得以成立,那么翻译手册就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因为在博物馆神话中,语词和语句都有其确定的意义。因此,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所要证明的是语句背后的意义实体(即命题)是站不住脚的,而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所要表明的是我们有多构造世界的

^①W. V. Quin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ga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84, 1987, pp. 9—10.

^②W. V. Quine, *Pursuit of Truth* (Rev. ed.), p. 101.

方式。^①这两个论题相互支持,都与经验证据发生联系,而蒯因的整体论则是这两个论题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据,并且也是贯穿两个论题始终的。

四、结语

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是关于证据的论题,翻译的不确定性是一个语义学论题。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只是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的一个特例,即使我们以非常任意的方式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我们是通过感觉来把握证据或实在的,而这种把握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感官的能力所及,我们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理论予以修正或取舍,这里必然存在事实问题。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是对传统的未加批判的语义学的质疑与挑战,其结果不是虚无主义,更不是没有可以接受的翻译,相反却有许多与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符的翻译手册,我们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这里不存在事实问题。简言之,我们可以根据事实或实在本身对经验上等价的科学理论进行真假判断与选择;然而,我们无法根据事实或实在本身对行为上等价的翻译手册进行真假判断和选择。

(责任编辑:杨嵘均)

Quine's Thesis of Indeterminacy and Facts of the Matter

HU Ting-shu

Abstract: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re two different indeterminate theses. There are obvious link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wo indeterminacies are both based on holism, and they both have different systems that are logically incompatible, but empirically equivalent. The former claims that there is not merely one correct translation manual for different translation systems that are empirically equivalent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meaning as entities and there is no fact of the matter about meaning; the latter claims that two logically incompatible but empirically equivalent theory systems cannot be both true simultaneously and there is a fact of the matter. If we choose one theory, it means that we will refuse the opposite theory.

Key words: Quine; underdetermination; indeterminacy; 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 fact of the matter

^①W. V. Quine, *Pursuit of Truth* (Rev. ed.), p. 102.